



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



段云章 编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段云章
编著

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 (增订本)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合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段云章编著. 一增订本—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8

(岭南文库)

ISBN 978-7-218-07285-2

I. ①孙… II. ①段… III. ①孙中山 (1866 ~ 1925) 一年谱 IV. ①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4015 号

Sunwen Yu Riben Shishibiannian

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

段云章 编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沈展云 谢 尚

封面设计: 亦可艺社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18-07285-2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9 插 页: 6 字 数: 610 千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9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 购: (020) 83781421

ISBN 978-7-218-07285-2



9 787218 072852 >

《岭南文库》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 19 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锦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

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岭南文库》书目为 350 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元旦

岭南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幼军 卢钟鹤 叶选平 刘斯奋 朱小丹
杨应彬 杨资元 李兰芳 陈越平 林 若
钟阳胜 黄 浩 黄华华 雷于蓝 蔡东士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编：林 雄

岑 桑 (执行)

副主编：顾作义 曾宪志

陈海烈 (执行)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桂科	卞恩才	卢子辉	朱仲南	刘扳盛
麦英豪	杜传贵	杨以凯	李达强	李夏铭
李锦全	岑 桑	沈展云	何祖敏	张 磊
陈泽泓	陈俊年	陈海烈	林 雄	金炳亮
郑广宁	胡守为	饶芑子	洪志军	顾作义
倪俊明	黄天骥	黄尚立	曾牧野	曾宪志

增订本说明

本书于1996年初版后，在这方面又有不少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值得补充。但我从那以后，已转到另一课题的史料蒐集与研究，虽于2009年应台湾中山文化学术基金会之约，撰写《中山先生的世界观》，涉及孙的对日观，亦因任务紧迫，所写不宜过详，未再广搜新资料；而本书初版时限于篇幅所删数万字又惜未保存；自己的多年藏书、资料于去年又已捐赠给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加之我已年逾八旬，疾病多发，因此，增订本书面临诸多困难。我仅尽力之所及，增补现能搜集到的有关资料及研究成果，尤对久保田文次、俞辛焯、李吉奎诸先生于1996年后所出编著多有录用，但增订本仍多有缺漏，尚冀方家、读者续予补正。

在本书初版的前言中，我曾据实表明：“本书虽由我写成，它却凝结了众多中日学者的心血。”本书的增订出版，并纳入《岭南文库》，也应如此说。首先是主持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金炳亮社长及其所属《岭南文库》执行主编岑桑先生，以及本书编辑沈展云，对出版增订本的支持；在进一步增补资料时，又得到黄彦、倪俊明、李吉奎、孙宏云等先生的慨然勛助；谢尚对本书的编辑亦多费心力。这里，谨对他们致以诚挚谢意。

增订本仍循初版本编写原则，力图实事求是，循名责实，不加主观意图，引文仅择其要点，未予详述。因考虑到史事和

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本）

有关社会历史环境的密切关连，故酌增了一点相关史事。增订本在引用文献资料和字数均较前有所增添，初步统计，现采用各种文献资料约四百种。为便于读者研究、查阅原著，特列其目录于书末。

段云章

2011年7月

序

段云章教授的又一力作《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行将问世，我为老朋友的新成果热烈鼓掌、喝彩。

孙文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巨人。走出中世纪迈向近现代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是从孙文开始的。因为造反，他大半生流亡海外，有家归不得。为了革命，他几乎走遍全世界，寻求友谊和支助。日本是和他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他曾十四次进出日本，每次居留时间或数日、或数月、或数年不等，累计达九年左右，约占他流亡生涯的一半，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他结识的日本人，包括政、军、财、学及其他各界人士约三百人，其中知名人士就在五十人以上。他创建的中国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本部都设在日本。他亲自或派代表和日本政府进行过多次交涉，对日本朝、野人士抱着殷切的期望，包含几许错觉与幻想。在一通函件里，他自认在他的眼中，日本“无异第二之母邦”。然而，孙文所从事的振兴中华的革命事业，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扼制中国、侵略中国的图谋是根本对立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目的是利用孙文及其革命势力以不断扩展其侵华权益，乃至灭亡中国。对待孙文，有时笑脸相迎，有时若即若离，有时又拒之门外；或把孙文作为向中国当局诈取权益时讨价还价的砝码；或企图让孙文为之火中取栗；或想利用孙文的困难饵以小惠换取来日之大利；或其用心就在于扰乱中国、削弱中国。从总体上说，孙文与日本的关系便不能不是中国革

命者向帝国主义国家寻求援助的失败的记录。不过，在他所结识的众多日本人中，又确实有些人出于振兴亚洲的善良愿望，主张中日提携、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迫，同情和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成为孙文的真朋友。这些日本友人，为孙文鼓吹呐喊，出谋划策，奔走运作，甚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而谱写了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情谊的篇章。真朋友和假朋友错杂，扼制、利用、支助并呈，这样，就使得孙文与日本的关系成为一幅繁复纷纭、扑朔迷离的长卷。显然，要想全面地、清晰地展示孙文与日本的关系，是一件很不轻松的任务。

详细地占有有关资料是展示孙文与日本关系全貌的前提。《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为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充分的线索。段云章教授穷数年之力，并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支助，广泛地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搜集的范围包括日本官方档案，孙文本人及有关人士的著作、书信、日记、传记，当年的报纸杂志，当时和后来学者们的有关论著等。采摭图书报刊达三百数十种，其中仅中、日文报刊就约有七十种。虽不能说搜罗无遗，但可以说达到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水平。段云章教授把大量资料所反映的有关史事，扼要地按年记述，并尽量引述原文或关键词句，不仅集中整理了众多分散、零乱的资料，而且挖掘出不少罕见的、珍贵的新资料，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基础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是一部资料性很强的书，但又不是资料汇编。它既容纳了方方面面的资料，又简明扼要、有序可寻，便于查阅。段云章教授对浩繁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剪裁和处理，剔其重叠，删其芜杂，考其异同，力求史实的准确，堪称披沙拣金。从而，这部书既有可以放心使用的可信性、可靠性，又具有简洁、清晰的可读性。这部书的出版，

可望将孙文与日本关系的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我完全赞同段云章教授提出的“坚持实事求是”、“循名责实”的编撰方针。但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既要展示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操纵、扼制中国革命力量的种种图谋和手段，又要展示孙文对日本当局的期望、幻想以及认识逐步提高的曲折过程，还要展示孙文和日本民间友好人士相互支持、共同前进的言论与活动，并将上述种种和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让读者易于理解，在史实资料的剪裁方面，在主次、详略、取舍之间往往存在着难以处理和尚须斟酌的地方。而且，编年不能代替论述，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发扬中日人民的友好情谊，我期望着在此基础上将有进一步全面地、清晰地展示孙文与日本关系的论著问世，以飨读者。

李时岳

1995年10月7日

前 言

当这部书稿提交出版日程之时，不胜百感交乘。我虽然庆幸这一近十年积成的成果终于和读者见面，却又深恐有负长期关注和帮助我编成此书的中外友人的期待；孙文和日本的关系本来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但又因限于自身知识面和篇幅而无法充分展示其完整内涵。为使读者了解本书旨趣和成书经过，特作以下几点说明。

此书之作，原为日本孙文研究会监事中村哲夫教授于1987年致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函中提出，拟由八位日本学者和包括我在内的三位中国研究者共同编写。中国孙中山研究会行文到三位中国研究者单位征求意见。我校曾复函表示赞同。1988年春，中村哲夫教授来广州中山大学研究一年，其间与广东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黄彦教授和我就此事进行过多 次磋商，共同拟订了编写本书的原则、方法和步骤。是年冬，我应日本孙文研究会之邀访问日本，又就此听取了东京、京都、神户的 日本学者的意见，并获赠一批有关此课题的日本资料。随后日本一些学者又陆续将有关资料寄赠。1989年2月，我完成了1912—1925年部分的该书中文征求意见稿，承广东孙中山研究会资助，打印成二册，分送给中日有关学者审查。随后又陆续将1911年前部分写成初稿，并依据陆续所获新资料，对前此所写部分进行了较多补充和修改。本书出版

前，又按照编者要求作了删削修订。

在编写本书期间，赠送资料或者审阅过本书初稿、提出过修改意见的，有中国学者陈锡祺、金冲及、俞辛焯、张磊、黄彦、李时岳、李吉奎等教授和留学日本的马燕女士，日本学者有山口一郎、野泽丰、狭间直树、中村哲夫、陈德仁、安井三吉、伊原泽周、久保田文次、久保田博子、藤井昇三、山田辰雄、中村义、小岛淑男等教授和孙中山生前同志王敬祥的后嗣王柏林先生。本书所用日本资料部分来自已出版的论著或专文译文，部分系请马宁、黄倬汉教授、贺耀夫副教授、陈明先生等翻译。在上述提供帮助的诸位先生中，黄彦、中村哲夫教授给予了始终一贯的关注，黄彦教授尤对1904年前部分进行了精心校阅，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现任日本孙文研究会会长狭间直树教授至今犹不断寄来日文资料，关心本书的修改定稿。李时岳教授对本书最后修改定稿费了不少心神，并为本书赐序。柏峰、何文平同志帮助校对。在此谨对上述先生女士深表谢意。

编写本书的意图，是力图通过中日学者真诚合作，广泛搜集整理有关资料，较全面较清晰地展示孙文与日本的关系，以便总结历史经验，发扬孙文和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的一面。这个意图很可能因我主观能力受到限制而没有很好实现；但从上述可以看到：本书虽由我写成，它却凝结了众多中日学者的心血，反映了这些学者为促成上述意图的实现而竭诚合作的精神和难能可贵的友谊。可以说，没有这样的支持、帮助与合作，这本书是不可能写成和出版的。在这一成书的较长过程中，我虽有过成书之难的感叹，但也获取了从未享有的如此多的中外友人的深情厚谊与多方鼓励。应该说，这就是我坚持不懈地完成本书的一大动力。至于本书存在的疏漏谬误，自应由我负责，尚希读者批评指正。

二

孙文在和外国人打交道中，日本人士可谓最多，他流亡居留日本时间也最长，其与日本发生关系的事件也最为纷繁，不少还给人扑朔迷离之感。在这些方面，中文资料固然不少，日文资料更为大量。近年来，随着中日档案资料的陆续披露和中日学术交流的增进，系统推出、评介或散见于中日论著中的孙文和日本关系的资料越来越多，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缺乏系统整理，而且挖掘译介仍很不够，这对于拓宽和加深这一仍有发展余地的研究领域、解决有关争论疑点实多有碍。本书诚然不可能完全满足研究者的需求，但编写者近十年一直注意这方面特别是有关重大问题的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希图择要地或者将资料线索贡献给读者。

本书征引的中日图书、档案、报刊资料约三百四十多种。在资料的选择和编写过程中，本书力图体现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应当实事求是，以摆明事实为准则。既不为尊者讳，亦不因人废言废事。要看到孙文和许多有关事件人物都是充满矛盾的社会的产物，也就必然表现出双重性或多重性，出现矛盾现象是正常的；有好有坏，时好时坏，也并不罕见；而且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故不能取其一而舍其余，以偏概全。比如，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既摆明这次战争的进程及中国的失败，促使孙文决志救亡反清，又记述孙文在战争硝烟未散时就通过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向日本政府求助起义军械；1915年，既有孙文反对袁世凯为获取日本支持其复辟称帝而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记述，也对他在当时为争取日本援助其进行反袁斗争而拟与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签订中日盟约十一条如实载明；直到孙文晚年，在记载他反对帝国

主义和军阀、坚决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同时，仍对他在1924年11月访问日本时在收回旅顺、大连和支持朝鲜独立等问题上所持的有意回避乃至含糊态度的资料不予疏略。在他交往的日本人中，既有真朋友，也有别有用心的假朋友、真敌人，对前者，固然需要充分展示其事迹和真情；对后者，也决不以义愤来代替科学，对他们对待孙文及其革命事业的千姿百态，不同的意图、品格和客观效果都从实录入，务求客观，不加主观评论。如此等等，究竟该如何结合历史环境进行评析，则由读者、研究者自行审辨思考了。

第二，循名责实，以展示孙文与日本的关系为中心。据此，在史料的整理编排上，力求以双方关系为主轴，以各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为绳结，依次展示相互关联的史实，希望做到一环紧扣一环，较清楚地显示出双方关系的发展道路。基于这种关系的极其错综复杂和多层多面性，为使研究者便于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考察，我在重视摆明微观资料的同时，对有关中日关系、并对双方关系有影响的重要事件（包括中日两国政局的重大变化、内阁更迭、重要战争和有关中日关系的重要条约等）作简要标明并列入孙文对此作出的一些反应资料；对虽非孙文本人、却同他与日本关系有密切牵连的人物的活动和著述，也酌情将有关史料编入。

第三，考虑到许多资料本身就含有记述者的主观意图和感情等复杂因素，乃至有意制造与客观事实相乖离的情形，或有不尽符合事实的谬误。故对中外资料，甚至原始档案都须严格甄别，对中外史料的记述不一之处尤须注意。为此，本书常采中外资料并用，以供研究者参照，有些地方还作了考证。

三

孙文与日本关系是多方面的，其发展道路亦甚为迂曲多

变。本书的主要着眼点在以下三方面。

一，孙文和日本军、政、财界的关系，特别是他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认识过程及其认识高度。

孙文和日本人士接触或者有函电相通者最多，历时亦较长，有名可查者近三百人。其中不少是日本军、政、财界要人，有的人士如山县有朋、桂太郎、井上馨、松方正义、大隈重信、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板垣退助、上原勇作、田中义一、犬养毅、平冈浩太郎、久原房之助等对日本政局和对华政策的制定都有影响。孙文和这些人的交往，实际上体现着日本军、政、财界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本书通过各种资料尽可能披露这些人士对孙文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其他革新派别所施展的分别操纵利用、希图维持和扩大在华权益的图谋和手段，也力图展示出孙文与此因应而表现的幻想与策略运用交织、寄望与失望交替的情形。希望通过本书，读者便于看到，孙文是沿着不断加深认识、清除幻想、提高斗争艺术、坚定反帝目标的道路前进的。但因中国和孙文与上述某些日本人士的长期特殊关系，使得孙文在这方面的认识最终仍难摆脱某种局限。

二，孙文和民间组织、人士的联系，特别是和日本真诚援华志士相互支持和帮助的资料，其中也包括通过日本志士介绍得与朝鲜、印度、越南等国流亡日本的志士相交结的资料。

以1895年1月孙文与日本志士梅屋庄吉交往开始，孙文陆续与南方熊楠、宫崎寅藏兄弟、平山周、头山满、山田良政兄弟、福本诚、寺尾亨、池亨吉、副岛义一、萱野长知、秋山定辅、和田瑞、北辉次郎、内田良平、宗方小太郎、清藤幸七郎、的野半介、菅原传、柏原文太郎、近藤五郎、岛田经一、末永节等民间人士相交往。这些人士多为日本半官方的侵华团体如东亚同文会、东邦协会、黑龙会等的成员，但又不能全以

团体宗旨来确定其成员意向。他们对孙文及其事业的态度千差万别，须分别考究评价。有抱持支那革命主义者，即以支助中国革命、振兴亚洲、共同对付西方侵略为其职志，如宫崎兄弟、南方熊楠、梅屋庄吉、萱野长知、秋山定辅等。多数则是秉承日本军、政、财界巨头意旨，意在通过参与孙文领导的革命运动，操纵中国革新力量，达到日本在华扩张势力的目的；但各人背景、手段、发展道路又往往互异。这些真假朋友和孙文的关系有深有浅、有长有短、有合有离，其发展和接受历史检验都有一个过程。孙文对他们的认识也有一个复杂曲折的或长或短的过程。这在本书中大多可以找到资料说明，并且可以从中看到孙文是如何通过革命实践，披沙拣金，选择自己的真朋友的。

三、孙文与日本有关人士共同谋求中日两国团结合作，振兴亚洲，对付西方列强侵略，保障和促进世界和平、进步与繁荣的言论。

从19世纪90年代孙文和梅屋庄吉、宫崎寅藏等共抒上述抱负起，到1924年11月孙文在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孙文和一些日本志士发表这方面的言论甚多，但其中蛊惑人心、以假乱真者也不少。本书除将孙文关于这方面的言论摘要录用外，还将一些与此相呼应的真诚主张中日友好合作和共同振兴亚洲的日本志士和报刊的言论摘用；对孙文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所引起的日本舆论反应，更有较多摘录。对孙文逝世后，日本志士以及与日本有较密切关系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志士的有关反应，以及宋庆龄接见梅屋庄吉后嗣的有关言论，也酌予引载。其目的在于使读者了解孙文和日本志士共有的上述抱负，不仅深合中日两国和亚洲乃至世界进步人士的心理，而且在历经曲折之后，益为后继者所珍重。

上述三个方面，相应的分别体现和交织于孙文与日本关系